

身后荣哀、盖棺定论

唐廷枢在经营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十多年中，经常天南地北地查勘，创办多处矿产资源和采矿事务，而本人则多次奉命周游欧美各国，考察商务和更多的外事活动……说得上是身心交瘁，1892年（光绪十八年）秋天，天津地区出现疫症，唐氏不幸染上瘟疫病逝。

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对唐廷枢的一生，引用上海《远东日报》的一则评论表达对唐氏的怀念，全文如下：

“光绪十八年，唐景星君卒于天津之开平局，后在局中公事房，检出光绪四年（1878）上海远东报，读其文想其为人，景公诚人杰乎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心，窃向往焉。记录其报章如下：『1878年上海远东日报』‘唐景星君以1832年（道光十二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地方。其早年教育，自1842年（道光廿二年）至1848年（道光廿八年）得受业于香港马礼逊教科学，继进英国教会学堂，由是于1851年（咸丰元年）充香港巡理厅翻译，二年后升正翻译。1856年至1857年之间，代理香港大审院（高等法院）华人正翻译。于1858年（咸丰九年至同治二年）当正大写及总翻译之职。后由乃兄茂枝君接办，为因怡和行东聘请代理该行长江一带生意，1863年即为怡和行总买办。至1873年，斯时又兼当协和机器轮船公司（公正轮船公司）北清机器轮船公司，华海机器轮船公司之董事。此三公司幸得唐君之卓力而能成功者也。伊又于上海丝茶两业会馆并各善堂均为董事。1873年，奉直隶总督李公鸿章之命而为中国招商总局总办，此缺现仍充当。伊乃一花翎二品衔福建候补道，如是可见其早年之机遇若何广大深谋。

远虑而能善用之也。破除旧时之锢习，采用新法，习国人之资，用众人之功，以组织协和（公正）、北清、华海三轮船公司均以西法经营之。又得国人之信任，所见之明无可及也。伊为中国未经创见最大方略之领袖，又办招商局，得政府辅以巨资，不特广华人之事业，而其用人行政，皆用本国之人，惟其中数部，须专门技术，为华人所未能者，方始用西人管理。该公司虽纯用西法管理，尽为中国之事业，唐君得国中最有权力极高明之贵人李鸿章以为庇护之主，诚大幸也。此二公若能如余等所望得享永年，于国中之商务大有进步者也。现近之方略，唐君与有名者为创办开平煤矿，亦纯用西法经理，为余等从来所未经遇见，伊初创一事，几动一念即能预知其结果，而竭力营谋之，今开平煤矿之发达，是可操券而得也。我西人日与华人互相周旋，惟此君之广识博览，实令人钦佩者也”。

在一百年前，一份纯属资本主义的报纸，竟然如此推崇唐廷枢，不是毫无道理的，虽然文章中并没有描述唐廷枢有多大的“丰功伟绩”，但却明确指出“破除旧时之锢习，采用新法。集国人之资，用众人之功。其用人行政，皆用本国之人，须专门技术，方始用西人管理。该公司虽纯用西法管理，尽为中国之事业……”如此等等，正好说明唐廷枢和他同时期的一群民族资本家对我国近代史时期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其现实的启发意义。

唐廷枢逝后，中外各界深表惋惜，多国驻津领事馆，在公祭日下半旗致哀，在灵柩南归途中，有十三个国家的商务官员乘搭专船护送至唐家湾海面然后离去。墓地选葬在今珠海市吉大村一处山顶上，由于长期无人祭扫，在特区房地产

开发中被湮没，殊为可惜。

在天津公祭仪式之日，李鸿章在主祭后对舆论界说“要找一个人来填补他的位置，是不容易的”。而当时的舆论也认为“唐景星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时代，他的死……是一个持久的损失”。

当然：从轮船招商局到开平煤矿以及众多企业的举办及其成就，是由当年众多的，原籍今天珠海特区的买办们的共同努力，而并非唐廷枢个人的功劳。虽然唐氏本人在1878年经营招商局到1892年在开平矿务任内去世的十多年中，也有过不少失当之处，但是唐廷枢的宏才伟略，见识广博；处事兢兢业业的优点，使他无愧地为历史作出一定的贡献，这是肯定的。

合作获得了丰收

《怡和洋行150周年特刊》用上述标题对唐廷枢最后的一段历史作了概括：

“就在那一年（1888），开平召开了第一次正式股东会议，发出第一次有6%的红利（上海的股东们在怡和公司一个办事处领取红利）唐的政策是把利润重新投入资本，这个计划是在开平矿以东约十五英里的林西开新的矿井。招募的新股资，使开平股资总数上升到一百五十万两。1889年林西矿开始生产，新股份很快就销售出去。《华北先驱报》（North China Herald）在九月份曾评论道：这可以大量说明，唐在上海富有的商界与其他地方所享有的信誉，如果中国拥有像他那样更多的人物，各式各样工商企业的发展，将顺利地展开。

当然，这位从前是买办的人物，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支持，是不可能达到如此成就的。李在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

认真地促进了中国商船，矿务与铁路，更遑论他在舰队与基地上的成就了。同样清楚的是，如果没有唐的意见与经验（从他与怡和之间得来的）中国工业化早期的努力和成就将大大减少。1879年英国驻天津的领事丹尼（O. N. Denny）认为唐是一个为了造福国家，最主要的事是接受现代化教育的意念。《华北先驱报》在他死后，曾把他描绘成一个顺从同胞的偏见而从不偏移自己目的的人。1887年，该报对他在开平矿务局的管理方面，曾作过最严厉的评论，指出：一个矿在有发展的前途下，有如开平，那些董事们、经理们、官员们的亲属大量的涌入，不考虑他们的工作能力，一个人走上职位而肥起来。的确如此，唐的儿子成为公司的重要官员，有差不多七十位亲属（包括妇女儿童）和他一起在开平。他所享受的、相对稳定的开平领导地位，是李总督信任的关系。1892年唐廷枢逝后，李鸿章的影响力也已衰落，只好接受一个腐化与没有能力的西太后亲信旗人（指张翼）作为开平的主要经理。不像他在怡和的朋友所期望，唐无法冀求在法律保护下，使他的事业延续。

虽然历尽沧桑，开平的事业在唐的管理下，的确为中国贡献了财富与好处，有如招商局在中国水域与外国航运贸易进行了竞争。开平使主要港口天津无需进口洋煤，而且还供应驶来天津的轮船以大量煤斤，1885年，当中国进口煤超过三十万吨时，开平的产量已达187,000吨，同样重要的是，开平的煤，当地可以廉价买到，使附近地区获得燃料供应而刺激农村小型工业的发展。唐山的周围，私有的砖、灰窑、陶制品工厂与酒厂蓬勃兴起。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平雇用了三千名矿工，还不包括一千二百名在其他车间与辅助事业如烧炭、砖

瓦和水泥厂的工人，在林西煤矿，也雇用了两千多矿工。

在路矿两局中，约有五百名广东籍熟练工人，他们把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工人们，对于一些精湛的工程师，唐建立一所化验与开采的学校（按指唐山路矿学堂）由一位美国化学与矿物学家进行授课。通过怡和雇用的工程师们，继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雇用的西籍人数达到最高峰，以后逐步减少。

与招商局一样，唐以开平矿为榜样，说明中国商人可以集资以支援工业化，与招商局不同的是，开平的成功，政府方面只是资助了有限的数目。在创办时通过李鸿章的安排贷了十万两，直至1889年，开平向英国购了一条新船并另外订购三条船，用以运煤到李的海军（指北洋水师）港口旅顺。威海与烟台，海军衙门预支了五十万两给煤矿公司，唐的煤矿之所以能扩展它的设备与生产力，主要是靠利润的回收。

唐的煤矿公司所建的七英里铁路（指唐胥铁路）不但刺激而且促进了李鸿章的铁路计划。在当年中国，这些革新措施，单独靠这位前任买办（指唐）是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抗拒的反对势力的，可是由于他愿意冒险（财政及其他方面）结果：综合工程师金达的专长和李鸿章的支持，终于成功建成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在他死前将近两年中，唐的健康已日益衰退，1892年，在他六十岁生日（按中国习俗为61岁）日益接近时，他看来已经很满足他的生活与工作，徐润1892年二月前来探望他，目睹了唐的生日盛典。附近48个乡村的矿工与工人们，士绅与商人，聚集一起给唐送上一把〈万民伞〉（一种少有的，送给某个官员，表达公众景仰和感谢其恩典的标志）。

当他还是一名怡和买办时，唐像当年商贾习惯那样捐钱买到一项官衔（候补道），在他主持招商局期间，他被奏调为福建候补道，1884年，他又进一步被推荐为更高的官位（指被李鸿章保奏堪备各国使臣）1892年五月间，花了七天庆祝他的寿诞，五月十八日，他坐火车到天津，在同业公会庞大的酒宴上，李总督亲自祝贺他长寿。使他同样感到温暖的是，五月廿一日，他在开平的西方同僚们，为他荣名所举行的一次宴会，四周挂满了写着金色贺词的大红帷幛，中西人士共聚一堂，庆祝他的成就。几个月后，唐离世而去，当时他心中一定很安慰，由于他曾为弥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出了力。”

作为一代历史人物，唐廷枢、唐茂枝、唐廷庚三兄弟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唐宝臣是澳门（香港）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博士的听差，由于他愿意签订延长八年佣工合同，唐氏兄弟才获得免费入学。毕业后，经过七年在香港殖民政府任翻译，三年在上海海关任总翻译，在工作中唐廷枢获得丰富的国际工作知识，在任职怡和洋行买办十年中，唐氏熟悉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商业知识特别是航运和机械生产力的知识，这种包罗万有的知识和实践，是任何学校都无法得到的。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唐氏与其同时代的买办们，有着极其良好的感情和获得他们的信任。

如果没有民族的自尊心，唐廷枢也许为怡和洋行鞠躬尽瘁做一辈子买办。同样，如果没有企业家的雄心壮志，当年这群原籍今天珠海特区的买办们，也不会协助唐氏去经营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一系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从而使他们由封建行会组织，经过附股洋行的活动向民族资本转变。创办了一百多年的招商局、唐山煤矿今天仍然继续发扬光大，这些成就便是他们对历史的贡献！